

苏 中 关 系

〔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合著

苏 中 关 系

1945—1980

〔苏〕奥·鲍·鲍里索夫 合著
鲍·特·科洛斯科夫

肖东川 谭 实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О. Б. Борисов, Б. Т. Колоско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Москва, 1980

根据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980 年增订第三版译出

苏 中 关 系

1945—1980

〔苏〕奥·鲍·鲍里索夫 合著
鲍·特·科洛斯科夫

肖东川 谭 实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25 印张 437,000 字

1982 年 4 月第 1 版 198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200

书号 3002·231 定价 2.15 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本书主要作者奥·鲍·鲍里索夫是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奥·鲍·拉赫马宁的化名，亦即人们熟知的所谓苏中关系专家、反华干将罗满宁。他与鲍·特·科洛斯科夫合写的这部著作集中了苏联当局对苏中两党、两国关系和对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观点。作者从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立场出发，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全部推卸在中国党和政府身上，对我国的内外政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恣意歪曲，篡改历史，甚至捏造事实，攻击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本书出版之后一直是苏联官方和学术界经常援引的权威性反华专著。1975年美国根据原著第一版出版了英译本；西方把本书视为研究苏中关系的“难得的文献”。1980年苏联又出版了增订第三版。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国际上，这部著作都有很大影响。由于这一特点，本书无疑对我国外交、宣传、学术研究等有关方面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译本对原著未作任何删节，只在极少情况下加了译者注。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西方对中苏关系的一些看法，我们还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弗拉季米尔·彼得罗夫博士为该书英译本所写的序和导言作为附录收在书后，以供参考。

一九八一年六月

F183 / K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章 击溃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的决定性

因素之一 1945—1949 年的苏中关系	7
-----------------------------	---

日本军国主义反苏计划中的满洲	8
----------------------	---

关东军的溃败和日本投降	10
-------------------	----

击败日本军国主义之后的满洲形势	16
-----------------------	----

苏联帮助巩固满洲革命根据地	21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苏中关系

(1949—1952 年)	35
---------------------	----

苏中关系中最初签订的文件及其意义	35
------------------------	----

苏联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给予的经济援助	39
-------------------------------	----

恢复时期结束时的苏中关系	44
--------------------	----

第三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苏中关系(1953—1957 年)...

1953至1955 年间苏中合作的进一步扩大	51
------------------------------	----

1956至1957 年的苏中关系	60
------------------------	----

1956至1957 年间苏中之间的政治合作	68
-----------------------------	----

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几年的苏中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	76
-------------------------------	----

第四章 中共领导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反苏倾向的表现及其

根源	86
----------	----

中共领导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的社会历史根源	87
------------------------------	----

四十年代初中共民族主义倾向发展史中的一些事实	95
1945至1949年间中共领导人的反苏民族主义表现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期中共领导政策中的反苏观点	103
促使中共党内民族主义倾向增长的因素	108

第五章 中共领导在内外政策中形成独特方针时期的苏中

关系	118
1958至1959年的苏中合作	118
修改中共八大决议与“三面红旗”政策	127
中共领导独特的对外方针及其对苏中关系的影响	141
1949至1959年苏中合作的若干总结	148

第六章 中共领导由执行中苏友好政策转向开展公开反对

苏共和苏联的斗争	159
六十年代初中国的国内状况	160
中共领导背离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原则	165
毛分子直接攻击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思想立场	172
苏共二十二大和中共领导人加紧进行反对各国兄弟党的意识 形态斗争	185
苏共为克服中共领导同苏共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 识形态分歧所作的努力	187
中国领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新攻击	190
北京抵制苏共中央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多次建议	193
1963年7月的苏中会谈	199
苏中国家关系的尖锐化	209
中共领导在中苏边界制造紧张局势的路线	220
中国就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的反苏运动	227
中国报刊在答复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借口下发 表的反苏言论	233

苏共中央制止苏中关系进一步尖锐化的尝试	234
中共领导在筹备兄弟党会议的问题上对苏共的攻击	236
中共领导在中国进一步煽动反苏主义	243
中国在苏中边界上的挑衅	246
1962至1964年的苏中经济、科技和文化合作	249
北京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加紧反苏活动	256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谴责中共领导的分裂方针	260
第七章 “文化革命”前夕的苏中关系	263
1964年11月的苏中会谈	265
中共领导人破坏苏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措施	272
苏联方面新的建设性步骤	275
北京领导人进一步恶化苏中关系	277
苏共二十三大对争取革命力量的团结所作的卓越贡献	284
苏中1965至1966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289
第八章 “文化革命”时期的苏中关系	294
“文化革命”的起源	295
反苏主义是“文化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311
“文化革命”的困难增多和中国领导反苏路线的加强	317
中共十二中全会·北京领导人的政治方针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342
中国当局1969年3月在苏中边界上挑起的武装挑衅	350
反苏主义是中共九大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359
1969年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击北京的分裂、反苏方针	364
苏中两国政府首脑1969年9月的会晤	370
1967至1969年的苏中经济联系	374
第九章 七十年代上半叶的苏中关系	380
中国国内形势的一些特点	380

北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389
北京阻挠苏中关系转向睦邻道路	395
苏共二十四大和恢复与发展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方针	403
苏联的建设性新步骤与北京的相反方针	409
北京的反苏方针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	416
反苏方针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的宪法	432
第十章 中共领导更迭前夕的苏中关系	436
北京内外政策危机的加深	436
在反苏主义升级的道路上	442
苏共二十大的决定是苏联对华政策的原则基础和全面纲领	449
第十一章 1976 年中共新领导上台后的苏中关系	456
中国新领导的上台	456
中国新领导继续推行一贯的反苏方针	462
第十二章 七十年代末的苏中关系	477
中国内部发展的基本趋向	477
北京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	493
1978年至1980年的苏中关系	513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年·若干总结	524
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	527
结束语	538
附 录:	
一、英译本序	542
二、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 中苏争论的根源	547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对外政策的演变	551
斯大林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558
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人	566

序 言

随着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这一进程的巨大影响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研究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的任务，变得日益重要和迫切。在这方面，研究苏中关系的任务具有头等意义，因为，不分析苏中关系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当代世界的真实情况。

苏联同中国的关系史不仅是两个国家间联系的历史。它同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史是分不开的，而苏联对这一斗争的援助和支持是这一史篇的重要方面。在中国的发展中，十月革命以后的对苏关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根本改革中国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这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际意义的具体表现，弗·伊·列宁把这一革命称为世界的转折点和世界历史新篇章。

十月革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打开了巨大缺口，极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力，从而无可估量地帮助了中国人民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十月革命，俄国不仅退出了威胁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且成为一个坚决站在中国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边的国家，这是使这一斗争顺利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国际因素。

中国先进的革命家们立即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命运所具有的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教授写道：“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①

苏联在对中国的关系中，始终不渝地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一贯把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苏联共产党人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把协助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创建它的政治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看作是自己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在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制定符合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条件的灵活的革命斗争战略和策略，就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尖锐的任务。我们的列宁主义党高兴地帮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向它传授自己的理论遗产和俄国无产阶级在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实际经验。

弗·伊·列宁密切注意中国革命的发展。弗·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著作、他对东方共产党人的建议，以及他同共产国际中国代表的谈话，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基础。《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以及列宁的很多其他著作，照亮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

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理论上很大的帮助。共产国际对解决中国革命运动的各种重大问题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这些问题有党的建设、工人阶级领导权、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在中国的作用、反帝统一战线、在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国红军的建设等。

中国共产党人承认，我党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的文献，其中包

① 李大钊：《论文和讲话选集》，莫斯科1985年版，第194页。

括约·维·斯大林的多次讲话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斗争问题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有过无可估量的意义。这些论断涉及中国革命的动力、特点以及各个阶段的基本任务等问题，包括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过渡到武装斗争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等结论。

中国的国际主义者共产党人李大钊、彭湃、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方志敏、王明等人十分了解我们党和国家的帮助和支持对中国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苏共中央在中共建党四十五周年时所发出的贺词中写道：“中国的国际主义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一贯强调同苏联工人阶级、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的团结一致对中国革命胜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①中国的国际主义共产党人为教育中共党员以及中国劳动人民忠于十月革命的思想，忠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进行了大量工作。

早在1917年12月，苏联政府就曾建议中国政府审理苏中关系问题，并考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原则。苏联政府倡议同形式上被看作是中国国民政府的北京政府就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关系的问题进行谈判。苏联政府声明将沙皇政府单独或同日本及其他国家一起掠夺中国人民的一切都归还给中国人民。

革命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声明给予中国劳动人民以兄弟般的声援。1919年7月25日，弗·伊·列宁领导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通过告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书，其中写道：“我们使人民摆脱外国刺刀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因为它们压迫被奴役的东方各族人民，其中首先是压迫中国人民。我们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②

① 《真理报》，1966年7月1日。

② 《苏中关系（1917—1957）》，文件集，莫斯科1959年版，第43页。

已经赢得胜利的革命的俄国从一开始就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给予它全力的援助和支持。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年代（1937—1945年），在苏中关系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在中国人民受到极其严峻的民族考验的这个时期里，我国对中国的真正国际主义立场鲜明地表现出来。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指出：“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①

1945年，苏联军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击溃了精锐的关东军，这对打败军国主义日本，以及从中国土地上全部赶走日本占领者起了决定性作用，成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国际因素。被苏军解放的满洲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可靠的军事战略基地。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这一基地领导人民同腐朽的国民党政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苏中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阶段。由于消灭了反动的国民党政权，清除了中国人民要求同苏联人民建立全面合作和友好道路上的障碍。两国紧密接近的历史趋势获得广泛的发展基础。新中国在消除经济落后、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有了苏联这个可靠的朋友和同盟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前十年雄辩地证明，具备了向这一方向发展苏中关系的一切客观条件，而这种发展是符合苏中两国劳动人民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中国始终不渝地执行列宁的国际主义方针，为发展和巩固两国、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同盟和全面合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① 《毛泽东选集》，莫斯科1953年版，第4卷，第552页（中文版第3卷，第1034页——译注）。

但是从五十年代末起，在苏中关系中不是由于我国的过错越来越公开地出现不良趋向。尽管苏联方面采取了措施，不好的趋向继续增长和加深。这就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脱离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和合作的政策，使它滑到反对这些国家的立场上去。很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联的相互关系不仅关系到苏中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整个国际局势有着深远的影响，严重地影响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的对比。

中国的领导人为了替分裂主义方针辩护，歪曲他们敌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原因。他们不顾一切地要使中国人民忘却关于苏联的一切美好的记忆，教育中国人民厌恶苏联的一切，从而为长期执行反苏政策准备条件。北京的反苏分子们粗暴地歪曲苏中关系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大肆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企图歪曲苏联的对外政策原则，歪曲和丑化苏共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真正作用，使其他各国人民不信任和敌视我们的党和国家。所以，反动的资产阶级宣传很乐意利用这些歪曲，把它们看作是对反社会主义的重要帮助。关于苏中关系发展的彻头彻尾的伪造的论点构成了近年来美国、英国、西德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发行的通俗小册子和多卷“研究著作”的基础。

但是，想要抹煞苏中关系的真相，利用各种伪造诬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主义对外政策的任何企图，显然是注定要失败的。苏中关系史是一系列事件的光辉史篇，而这些事件都无可辩驳地证明，苏共和苏联政府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始终旨在巩固我们两国的兄弟友谊和合作，全力援助和支持中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同时，历史事实还证明，苏中关系的发展并不象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期间一些作者所描述的那样简单和直率。它是个反映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复杂而矛盾的过程，一条是苏共巩固我们两党、两国

人民和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的始终一贯的路线，一条是与之相对立的中国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力量的路线。

在我们党的一系列的文件中，历次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中，以及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中，对苏中关系给予了原则性的评价和全面的分析。这些文件评述了各阶段苏中关系的情况，分析了苏中关系发展的过程，阐述了苏联在这个方面的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苏中关系史的很多方面，在近年出版的苏联作者的著作中得到了阐述。国内外关于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献和参考资料。

本书试图在总结现有材料的基础上，考察 1945 年至 1980 年苏中关系的发展，说明苏共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国际主义援助和支持的主要方面，我党和苏维埃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真正的列宁主义性质，说明这一政策是完全符合苏中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第一章

击溃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 决定性因素之一 1945—1949 年的苏中关系

中国革命既是国际形势发展的结果，也是深刻的内部发展过程的结果，而国内日益尖锐化的阶级矛盾和日益加强的民族解放的趋向则是内部发展过程的基础。这些矛盾的实质、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任务决定了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以及民主主义的性质。

同时，中国革命清楚地证明：在当代，在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比较弱、党需要首先依靠广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国家里，革命运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的援助和支持，取决于社会主义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取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力量对比中所占的地位。没有这种支持，革命的顺利发展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观点来观察中国革命，必须强调指出，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是中国革命顺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苏联对这一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945—1949年这一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这个阶段，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仅能够利用由于苏

军从日本占领者手中解放了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满洲所造成的总的有利条件，而且在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中直接依靠了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同时，应该指出，还在1947年延安就已落入了国民党分子手中，从此它就失去了作为革命力量中心的意义。从那时起，满洲革命根据地就成了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政权及其帝国主义帮凶的主要堡垒^①。

1945—1949年这一时期所以重要，还因为这一时期奠定了两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面合作的基础。

日本军国主义反苏计划中的满洲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反共、反苏、反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勾当中，把在满洲建立军事战略前进基地看作是具有头等意义的事情。他们为此发动了直接的侵略。1932年，日本建立了伪满洲国，开始狂热地开发这一地区的军事经济资源。这个地区的面积（按1944—1945年的边界计算为一百一十万平方公里）和工业生产比重（占中国整个工业生产的百分之二十以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满洲用火和剑镇压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行动。他们把精锐的军队和警察部队开到这里，把整个满洲变成一个集中营。日本军国主义者是苏中两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伙同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共同策划进一步扩大对苏中两国的侵略，以及远征新加坡、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日本总参谋部在发动东南亚战争之后，对轻易取得胜利暗自高兴。日本在东南亚侵占了大片领土，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对苏战

^① 关于满洲革命根据地，详见奥·鲍里索夫著《苏联和满洲革命根据地》一书，莫斯科1977年版。

争，而且一直在加紧进行这场战争的准备。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随时准备向北调遣。日本政府只是在等德国的“决定性胜利”：先是“莫斯科陷落”，然后是“斯大林格勒陷落”。日本报刊公开叫嚷要把苏联的远东归并给日本。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沿线各州，鄂木斯克以西要归属德国，鄂木斯克以东要归属日本。

按照德国法西斯征服苏联的“巴巴罗斯计划”的模式，日本总参谋部制订了“关东军特别演习计划”。^①在满洲的日本司令部全力忙于准备实现这个计划。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不打败苏联，他们就不能牢靠地霸占中国和东南亚，因为为反对日本占领者而开展游击战争的各国人民把苏联看作是他们的支柱。

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破坏苏日中立条约，同法西斯德国协调它进攻苏联的计划。1942年5月15日“第三帝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打电报给东京说，日本军队在苏满边境的集结是对德国的重大援助，“因为俄国至少要在东西伯利亚驻军以防止日俄冲突”。^②

日本司令部沿苏蒙边界紧急建立了军事基地，在满洲修筑战略铁路和公路，贮备机车车辆和燃料。日本海军自1941年至1945年扣留了一百七十八艘苏联商船，在远东海域击沉了十余艘苏联货船和客轮。不断从满洲向苏联派遣破坏小组。日本侦察机关经常向柏林提供有关苏联的谍报。

希特勒德国投降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继续进行太平洋战争，拒不放下武器，拒不承认失败。他们把主要希望寄托于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这是一支到1945年中期已经装备齐全并由精锐部队组成的部队。日本军国主义者指望依靠尚未遭美国空军轰炸的

^① 也称“关特演计划”，系日军总参谋部1941年夏制订的侵略苏联的战争计划。——译注

^② 见《真理报》，1948年2月20日。